

觉 醒 了 的 中 国

——美国人不了解的国家

〔英〕费里克斯·格林著

吴 越 初 扬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在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后写的观感；作者在具体地记载了我建
国初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也
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们回顾历
史，总结经验教训，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致 谢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亚洲、英国和美国一些人士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有的人帮助我整理手稿，有的人帮助我了解中国发生的事件。恕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我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忱。

我要特别感谢几十位甚至几百位中国朋友，我受到过他们殷勤的接待和礼遇，我占用过他们很多时间。他们之中有农民、科学家、工人、工程师、饭店服务员和政府部长。他们之中许多人有行政职务，但更多的是普通的公民。

他们渴望向我介绍中国，我也渴望了解中国，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1)
一、香 港.....	(1)
二、进入中国.....	(6)
三、开往北京的快车.....	(9)
四、宴 会.....	(19)
第二章.....	(27)
五、新旧北京.....	(27)
六、“我们拍手笑哈哈”.....	(41)
七、北京二、三事.....	(50)
第三章.....	(56)
八、装配线.....	(56)
九、沈阳：中国的匹兹堡.....	(72)
十、鞍山：钢都.....	(80)
十一、中国——工业大国.....	(87)
中国百态 (之一)	(105)

第四章	(114)
十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兴起的	(114)
十三、公社的基本结构和财务制度	(120)
十四、从全国的角度看公社化运动	(127)
十五、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133)
十六、西方报刊的报道	(141)
十七、公社访问记	(150)
中国百态 (之二)	(181)
第五章	(192)
十八、中国的法律	(192)
十九、一起离婚诉讼	(200)
二十、监狱：好的和坏的	(212)
二十一、办教育的群众路线	(222)
二十二、北京大学	(231)
二十三、舞蹈家万岁	(236)
二十四、波洛涅斯和驯顺的职员	(244)
二十五、城市人民公社	(256)
中国百态 (之三)	(267)
第六章	(277)
二十六、中国的立场	(277)

中国百态 (之四)	(308)
第七章	(319)
二十七、公共卫生和群众路线	(319)
二十八、女部长	(328)
二十九、“两条腿走路”	(338)
三十、不适应新社会的人	(344)
三十一、有钱人和聪明人	(355)
三十二、粮食和饥荒	(367)
三十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376)
第八章	(386)
三十四、“河水听我指挥”	(386)
三十五、长江流域纪行	(393)
三十六、上海一瞥	(401)
三十七、会见周恩来	(407)
后 记	(413)
译后记	(421)
附件 (略)	

前 言

过去十年中，经美国政府同意去过中国大陆的美国人不过十几个人，我是去过中国的三个记者中的一个，而且是两次访问过中国的唯一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在美国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假想和恐惧。我想我会看到一个极为贫困、极为肮脏和疾病丛生的国家。我以为那里的人民会因为警察国家的高压统治而怨声载道。我以为我会看到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俄国、其后在德国和意大利看到过的那种惶恐不安。这是我想象中的中国，但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中国。

我的想象和我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不同，开始的时候我曾感到迷惑不解，也感到焦躁不安。只要在中国呆几个小时，谁都会感到这里有一种简直可以摸得着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乐观情绪。我在中国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欢乐和信心，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作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职员，或以商人和自由撰稿者的身份，曾经游历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我认为我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旅游者，我有点玩腻了。我想没有哪一个新国家会使我再次感到激动和兴奋。但是我错了。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我第一次访华那样使我深受感动。我并不

是没有见到这个国家正在犯下的错误和仍然存在着的贫困。我也知道一些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发生的痛苦和流血的情况。但是想到我在中国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的成就，这一切就都有了新的意义。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我离开中国时所得到的印象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但是，象我这样对国际事务或许可以说是广闻博见的记者，为什么到中国去会如此毫无思想准备呢？道理很简单。美国不但和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断绝了有关中国的一切严肃的消息来源——而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地走向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前列。我坚信，对中国的这种无知，于我们的利益是危险和有害的。

一九五九年我又到过亚洲——这回我没有去中国，而是在中国的几个邻国撰写政治评论。我会见了一批亚洲领导人，其中有阿富汗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纳伊姆，尼泊尔外交大臣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和尼赫鲁先生作了长谈。我还访问了缅甸、泰国、老挝、新加坡和日本。和这些人士谈话之后，我明确地感到：亚洲领导人正怀着或敌视，或友好，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矛盾心理，注视着中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同时也等着瞧美国何时会理解这一现实并向其妥协。

为了应约写目前这本书，我在一九六〇年夏天第二次访问了中国。在这里我有必要作一点解释，我是作为一个侨居美国的英国人来写这本书的。我是说我既是英国人，又是美

国人，而且永远不能只居其一。我是在英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成年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美国是我的合法居留地，但是由于当记者和办理其他一些事务，我一年之中至少要去英国两次，从法律上说，我是一个英国公民（我到中国旅行就是用的英国护照）。实际上，无数的事务、友谊和家庭关系又把我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的大部分工作在美国，我的家庭在美国，我在美国结的婚，我的女儿安妮也在美国上学。

只有象我这样既在英国又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这两个国家都可以成为我的“祖国”；同时对两国效忠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矛盾。我想这种可能性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性的相似之处造成的。我作此解释是为了说明：我去中国虽然用的是英国护照（用美国护照是行不通的），但本书中的“我们”，（由于长期在感情上形成的习惯）却是指“我们”美国人。

到只有少数西方人士去过的共产党中国旅行，立即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我是否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我去的地方是否事先经过了美化？我是否单独旅行，或是总要有人陪同？我能否会见反对现政权的人士？那些人能否自由发表意见？这些问题并不都是能用“是”或“不是”这样简单的方式来回答的。但我认为本书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回答。

本书很大一部分引用了我的采访日记——我在旅行过程中所作的笔记；我还摘录了我从中国写给我的妻子埃琳娜和友人的信件。这些笔记和信件记录了我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也许这是自然的流露吧。任何去中国旅行的人都不能没有喜怒

哀乐，不能没有灰心、感动、困惑——但是谁也不会感到乏味。我相信，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好奇心的人，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不会感到厌烦的。

我试图把中国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方面写出来。但有许多明显的困难。在中国，要想弄到事实性的资料是不容易的。这里没有美国甚至俄国也有的标准的参考书。这里也没有能给你提供背景知识的长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西方外交使团虽然待人友好，也乐于助人，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还不如我这样到处游览的记者。还有，你想靠统计数字也是不行的。如果你引用统计数字，那么这些数字是“不可靠的”；如果你不引用数字，那么你写的报道又不那么“具体”。我搜集了一些我认为是真实的基本数据，对此，英国的工业专家、西方经济学家们以及其他人士也认为是准确的。

我想尽力表达的，是中国给人的感受，中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他们怎样生活，他们想些什么，这个国家是怎样运转的。我写的报道中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前后不一致的国家。中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这个国家正处在试验的高潮。这个国家在不停地变化。没有哪一个记者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他只能触及到一点皮毛。中国正处在大规模的社会和工业的剧变之中，剧变就不能总是受连贯性的支配。

组成中国这个画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看法。中国深深地卷入了和美国的纠纷。中国对世界

的看法带有敌视美国的色彩，而且这种敌视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政策。如果认为对美国的敌视是为了保持国内团结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而可以不予理睬，这是一种轻率的想法。敌视美国的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列举有说服力的事实和援引大量文献，向我阐述了为什么他们对美国那么反感。我把他们的谈话整理为本书中我称之为《中国的立场》的一章。读这一章也许不是那么舒服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最好还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会有那样的看法。

中国之所以难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人中对中国的党派偏见，以及中国人对美国的党派偏见。这种互不信任感使美中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但是这两个国家中，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另一个是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我们美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些变化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中国是“世界上的最大新闻”，而我们竟然没有自己的记者在那里采访这一重大新闻！

对中国的无知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加深了我们思想中那种荒谬的僵化。今天，似乎没有哪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不会引起争论。对一些人来说，甚至连议论中国似乎都是违反常情的；至于对我们的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分析中国政府的结构，研究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如此努力地工作，对许多人来说简直就是颠覆活动。但是不顾事实是不能使事实消失的。

我是带着许多问题重返中国的。一九五七年我在中国看到的许多情况，曾经使我感动，使我惊讶，那么自那时以来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中国人民是否仍然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政府呢？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否开始衰退了呢？在教育 and 医疗方面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还想了解有关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法律实施的更多情况，中国的监狱怎么样？中苏关系怎么样？我更想了解人民公社——我曾经读过不少可怕的报道，我上次访华时甚至还没有听说过公社的事。

为了寻求上述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答案，我在中国逗留了近五个月，行程一万多英里。和我谈过话的有政府部长、三轮车工人、政府部门负责人、作家。我参观过学校、工厂、监狱、医院。我访问过许多公社，和农民们一起呆过，并和他们一起在公社食堂就餐。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和周恩来总理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本书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所闻。

第一章

一、香港

五月二十三日

这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天。忙乱如常。我虽然把什么都推迟了或忘却了，但是要办的事仍然千头万绪。钢笔、活页纸、滤色镜、录音机备用的电池。城里的每一家商店都挂着大减价的牌子。我想买一架新式波勒克斯十六毫米摄影机，但马上又犹豫起来。他们允许拍摄公社的电影吗？可能不让。但是他们也可能让，很有可能——主意定了，我买了波勒克斯、可变焦距透镜、整套零件，加上那个我估计有半吨重的轻便三脚架。现在正是夏天，我扛着这一堆东西，穿过拥挤的大街，累得汗流浹背。

我第四次来到香港中国旅行社，第四次是不好的消息。仍然没有签证……

“很快就会办好的。”旅行社的人说。

“可是他们明确说广州已经批准了。”

“很快会办好的。”

我只好作罢。反正我目前对整个这件事是无能为力的。我想在离开之前见见桂玲……我雇了一辆车子到她工作的食

品店去……我去年见到她时，她正在那里工作。

“她走了。”食品店老板说。

“走了？到哪里去了？”

老板耸了耸肩膀。

我到海湾对面的九龙她租住的公寓去找她。那里也没有，我是说整个建筑物都没有了，房子被夷平了。那里空无一物，也无人可问；在一排可怕的建筑物中留下了一个洞，象一张张开的大嘴。失望之余，我发现自己仍然在拥挤的大街上寻找她，好象她就在附近似的。三百万人之中找一人，希望太小了！

下午很晚的时候我回到饭店。写字台上有一个电话记录，邀请我晚上六点钟到维多利亚山顶的一家大饭店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我七时到达，出乎我的意料，出席酒会的人很多。有几个人我曾经见过……有一些政府人士，几个新闻记者。香港是个记者出没的城市，每个人都想进入中国，但是大家都怀疑谁能进得去。然而我就要到中国去了。只要签证一到手，我就是这群记者中的佼佼者了。我无心于酒会上的一切，因为我太迫不及待了，太兴奋了，太接近中国了。

我端着酒杯走到阳台上。

万家灯火闪烁之下的地方，是香港城和停泊着船只的港口；黑色的水面泛着光亮，港口之外是九龙的灯火。更远一些，在黑色山峦后面就是中国。我又想起从中国来的桂玲，她如今在哪里呢？我想起所有其他象桂玲一样的人，那些衣着整洁、眼光闪烁不定的香港的中国姑娘，她们处境悲惨但又很坚强。曾经有多少人透过这神奇光亮的黑暗，探索她们

的生活道路呢？

一年之前我到香港来搞一次报道的时候，由朋友们（我想也是桂玲的远亲）介绍，我认识了她。她是一个难民……十九岁，敏捷，苗条，脸上挂着羞涩的笑。我带她出去吃过一两次饭，她给我谈过一些香港难民的生活情况。有一天我找到她工作的食品店。

“桂玲，”我说，“等你下了班，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啊，不，不！”她说，“你不会喜欢的，我住的地方糟透了。”

“这正是我要去看看的原因。”

她想了一会儿说：“那你就来吧，可是你得告诉你的读者香港的姑娘是怎样生活的。”

当天下午下班之后，我们乘轮渡到了九龙。桂玲的家在一座临街公寓的七层楼上。我们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黑暗而且散发着尿臭。我记得她拉着我的手穿过一条漆黑的走廊。她象盲人一样能用脚探路。打开房门后她开了灯。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房间比厕所大不了多少。

床是放在木架上的一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块垫子。屋里只够放一张床，剩下的就只有站着的地方了。这间房没有窗子，天花板上没罩的电灯是唯一的光源。

我问：“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三年了。”

房间是用薄木板隔开的，有一面墙还是纸板的。我们默然站着的时候，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嘈杂的脚步声。我记得桂玲的房间收拾得特别干净，但是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包括

空气和墙壁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她的东西装在一个小巧的壁柜里。在一个鞋盒大小的盒子上支着一张照片。这个穿着蓝色上装，显得那样利索、整洁的姑娘，就住在这样一间洞穴式的房子里，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房间里没有椅子——这里根本就没有搁一把椅子的余地，我们只好坐在床沿上。

桂玲说这比她第一次住的地方强多了，因为这间房是她一个人占用的。我拿起那张照片。这是一张在庭院里拍下的全家福，个个正襟危坐。“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桂玲告诉我说，“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她又指出谁是她的姐妹和姑姑、叔叔。“这张照片是在广州拍的，那时麻烦的事还没有开始。现在，我爸爸已经死了，我妈妈回到广州去了，但我不知道她具体的地址。我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一个姐姐在美国……”

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

她从我手里接过照片。她双手捧着照片，凝视着它，好象又回到了拍摄照片的那个庭院。

“你想回去吗？”我问。

她有好一会没有说话。“我想我们都想回去。那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准备回去。但是我有些害怕。那边的情况怎样？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如果我受不了……我还能出来吗？现在仍然还有一些人出走到香港来……他们告诉我一些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不写信来。我不能待在这里，但是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往美国移民已经停办了，不然我或许可以到那里去找我姐姐。我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你已经看到了我住的地方，你最好还是走吧。”

“走吧，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但是她仍然凝视着那张照片，摇了摇头。

我向她告别，自己摸索着从黑暗中下了楼梯。

这是一年以前的事。

现在她在哪里呢？回中国去了吗？或者仍然是个难民，还在这座城市底层的某个地方呢？

里面突然传来了音乐声，那是有人在摆弄电唱机。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人也来到了阳台上，他手里端着酒杯。

我们眺望香港的码头和远处山下九龙的灯火。

“我听说你要出发到希望之乡去了。”

“是的，明天动身。”

“你到底是怎样弄到签证的呢？有特殊关系吗？”

“没有。我等了好久了。当然，”我补充说，“我选择了一个英国爸爸，这帮了我的忙。”

他用指头弹着杯子。“去不了也没有关系，”他说，“香港可是个好地方……这里没有标语，没有公社，没有生产统计数字……还有姑娘！我敢打赌，当你被人领着在那些公社里转了一圈以后，你一定会特别想再回到香港来的。不过请记住，只要你敢对一个中国姑娘挤挤眼，你就得蹲班房。中国？够你受的！”